

文史通讯

注意
保存
内部
刊物

1

1979.8

80
794 1-2
目录
锦涛同志关于文史工作的讲话…………… (1)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召开工作座谈会…………… (2)

委员们关心文史资料工作…………… (4)

——来自五届政协二次会议的报导

蔡元培史料征集工作着手进行…………… (3)

文史资料工作的新课题…………… (7)

经验交流

把“抢救”革命史料放在首要地位…………… (9)

组织力量，突出重点，“抢救”史料…………… (12)

积极征集地方革命史资料

为文史资料工作开创新局面…………… (15)

拨乱反正，抓好文史工作…………… (16)

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总结…………… (20)

简讯四则

各地政协文史资料机构陆续恢复工作…………… (24)

各地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和出版概况…………… (24)

“西安事变”史料编辑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25)

《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新军斗争简史》

选题已落实…………… (25)

本刊启事…………… (2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

刘澜涛同志关于文史工作的讲话(摘要)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日上午，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刘澜涛同志对文史工作作了一次重要讲话。

澜涛同志说，文史工作是政协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也是我们党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近、现代史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现在，很多人都老了，但他们写的亲身经历的资料很可贵、很难得。因此，文史工作很重要，也是很光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其它工作更重要，因为你们搜集、整理、编写的史料，关系到这一代、下一代，甚至更远。

刘澜涛同志这番话是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全体干部座谈会上讲的。他说，历代封建朝廷都注意编写集大成的史书，特别是明代永乐、清代乾隆、康熙时候，整理了许多有价值的全书。他说，从清末到孙中山旧民主主义革命，一直到蒋介石统治二十二年，没有系统的历史的东西；我们党的近六十年的历史，作了大量的工作，但作为一个系统的、大规模的历史材料，也还没有。所以，一定要重视文史工作。资产阶级初期就搞了百科全书，马克思、恩格斯都向百科全书投稿。解放后，毛主席、周总理也关心文史工作，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就是周总理亲自提议建立的。

澜涛同志说，我们政协搜集文史资料，有许多便利条件。我们是全国性的统战组织，二千零一十六名委员，还有他们以外的许多有用人才。现在虽然搜集的是资料，但如比建一座高楼大厦，这就是砖瓦，甚至是栋梁，都是有用的东西。所以，文史的同志一定要把它看成光荣的任务。

澜涛同志说，文化大革命前出的五十五辑《文史资料选辑》，我看了一些，感到很有用处，类似这样的资料很少，当代人写当代事。他希望文史办公室的同志把《文史资料选辑》出得更好。

注：刘澜涛同志的讲话（摘要）是根据记录整理。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召开工作座谈会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利用五届政协二次会议各地委员来京开会的机会，于七月一日召开各地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主管文史工作的同志和全国政协负责文史资料工作的同志。全国政协文史委员、各个业务组的组长也参加了。此外还有全国妇联、各民主党派搞史料工作的同志等。

座谈会由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何长工同志主持。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有上海、浙江、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市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负责同志，他们分别介绍了当地文史资料工作的情况、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天津市政协文史负责同志作了书面发言。

大家的发言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应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史料的征集上。浙江省一年来新征集的史料有四百一十八篇二百四十多万字。上海市仅围绕“上海解放”这个中心内容，半年内就征集三千一百一十多万字专题史料。他们能在短期内征集到这么多的资料，是做了大量艰苦工作的。大量史料征集到手，就为整理、研究、利用以及编辑出版工作打下了基础。

二、重视原有史料的整理工作。文化大革命以前，各地政协征集的史料不但数量多，而且内容也很丰富。其中有些史料价值很高，急需加以整理、研究和利用。广东省文化大革命以前征集的史料有三千篇一千五百万字；广西省文化大革命前的史料有四千三百六十五篇一千七百万字。他们都把旧史料的整理工作放在重要位置。浙江省把旧稿一千八百五十五篇加以整理、分类、编目，以便研究、交流和利用。

三、积极地编辑、出版地方文史资料选辑。根据当地的需要和条件，在搜集、整理新旧史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文史资料选辑。浙江省和上海市一年内分别编辑出版了文史资料选辑五期。由于这些省市在征集史料工作中，注意到本地区的特点，因此在编辑出版时，除了现代史料外，还编辑出版特辑。例如浙江省出了一期《浙江革命史特辑》。上海市出的《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辑》，已出上、中两辑，下辑将在近期出版。广西、广东、天津、四川等地出版的选辑，也注意地方现代史的特点。

参加座谈会的四川省的同志还特别提到存真的问题，指出：存真是我们搞好文史资料的基本原则，只有尊重历史事实，文史资料才有价值。

这几个省市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之所以取得显著成绩，主要原因是：

一、党委重视，有的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部门的负责同志进行具体领导。二、充分发挥文史部门的积极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共同努力做好征集、研究、整理和出版工作。三、扩大同历史资料有关的单位和社会上的联系面，在业务上进行协作。座谈会上大家表示：为了做好文史资料工作，必须切实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文史资料工作上的流毒，解放思想，尊重历史事实，适应国家工作重点转向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为搜集、整理、编写革命史和近代史资料增添砖瓦。

(张世龄)

蔡元培史料征集工作着手进行

本刊讯 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于五月十七日邀请一些有关人士举行座谈，商讨了征集蔡元培先生史料的工作。座谈会由文化艺术组组长王芸生主持。

出席座谈会的多数是八十左右高龄的老人，有些人是蔡先生生前的老朋友、老同事。会上，吴觉农、陈翰笙、钱昌照、钱端升、李平衡、张毕来、戴白韬、何思源、高平叔等热烈发言，他们的发言，主委谈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蔡元培和五四运动；

二、蔡元培从一九〇二年建立「爱国学社」、与吴玉章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与宋庆龄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到发起为鲁迅治丧等各个时期的活动；

三、蔡元培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宣传劳工神圣、「以

美育代宗教」的客观效果；

四、蔡元培在教育改革方面的主张和措施；

五、蔡元培在文字改革方面的作用；

六、蔡元培在学术研究上的开路精神；

七、蔡元培在欧、美各国的活动。座谈时，大家谈到一九四〇年三月八日，毛主席给蔡史生的唁电，称之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先生的学识、道德、行动，可为一代师表。他的影响，不限于他的弟子，也不限于北京大学，而是影响到全民族全国家。他不仅在当时开风气之先，而是流风余韵，千古不朽。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兼容并包，既有顽固的辜鸿铭，又有革命的李大钊。五四当年，是革命力量要冒出来

(下转第8页)

委员们关心文史工作

——来自五届政协二次会议的报导

六月份召开的五届二次政协会议，可谓是一次盛会。委员们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好一个生机勃勃的景象呢！我们有幸参加了这次大会的工作，见闻很多，就委员们关心文史工作的事体，就有不少可谈的哩。

那不是罗老吗？大会开幕式那天，我们刚步入金壁辉煌的人民大会堂东休息厅，第一眼就看到了坐在前排的罗章龙教授。去年，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联合邀请他来北京，我们才刚刚熟识。可是今天一见面，罗老笑呵呵地先叫出了我们的姓名，使我们大吃一惊。”罗老，您记性真好”。如果是第一次见罗老的话，不会相信罗老已经八十高龄了。他身子板还满硬朗，谈话也颇有趣味。“不行，不行，我老了”。他风趣地回话说，“没想到，今天我们还能在这里见面呢”。罗老在忙中为我们撰写了好几篇有价值的史料，其中一篇“回忆‘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已经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了。罗老告诉我们，他最近从湖北财经学院调到了北京，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这次，罗老还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心情激动，十分感激党中央和组织上对他的关心照顾。的确，有不少委员，过去都为革命做出过贡献，或者多多少少做过有益于革命和进步事业的事，可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却蒙受了不白之冤。李逸民委员就是其中一个。正巧，我们刚上二楼，就遇到了他。“你的材料整理好了吗？”“呵呵，这一段工作太忙了，材料忘得不知放到那里去了”。战争年代冲锋打仗留下的脾气，使他说起话来豪爽直率。“回去我就找找，改好后马上给你们寄去”。李逸民，参加过我党发动的南昌起义，蹲过国民党的江苏军人监狱，现在是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顾问。他怎么也没想到，在敌人监狱进行过十年斗争的光荣史，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涂上了“叛徒”的墨迹。最近，他参加了文史委员会组织的江苏军人监狱座谈会，热情支持我们把监狱斗争史整理、编写出来，他自己也正在改写一篇，我们刚才索要的，正是这个材料。

会务工作忙起来后，我们没有多少机会可以和委员们直接接触了。可会议简报出的很勤，内容也很好。我们拣有关文史方面的，摘录几段吧：

“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十分重要，如果我们现在不及时抢救，这一段历史就要中断，后一代将‘数典忘祖’。所以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后代知道他们的幸福生活是先辈经过千辛万苦的斗争才得来的。”这是民进侯补中委、陕西

师大教授史念海委员的发言。

“政协文史资料的整理，特别是老解放区的文史资料，要核对，要采访，要加强人力”。这是农业部教育局副局长田心委员的发言。

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拉敏·索朗伦珠委员在发言中说：“西藏政协的工作，去年大会以后得到了恢复，对文史资料的编写和对外宣传都有了较大的收获。”他对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没有少数民族文字，提出了“翻译出版，以利学习”的建议。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白杨委员也参加了会议，她有个发言是这样说的，“文史资料是研究近现代史的重要资料之一，为了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文章一定要经过慎重的审核，去伪存真”。搞文史资料，要对人民对历史负责，这一句话说的太对了！整理史料的基点，就是尊重历史事实，不能有任何臆想编造，甚至染上不正之风，跟形势，随潮流，顺着某个人的意志。记得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张秀熟委员有个发言，把这个问题说的更生动了。他说，我们一个同志写篇政协历史的文章，当写到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选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时，把两个副主席写成×××、××，我问他，这是谁啊，怎么叫×××、××啊？张秀熟委员一针见血地说，这说明至今我们有些同志还心有余悸。不写人家的名字，就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嘛。

关于“抢救”史料，已是委员们的普遍要求，对怎样“抢救”的问题，宋汀委员提出“……过去有过草稿的要立即搜集、修改……有专门组织专管或兼管，……原来写战史的同志还可以继续完成这项任务……发文搜集……”等等。王定南委员提出，应设立文史资料出版社，加快文史资料的出版。他举了个例子：“山西省文化大革命前编印的十二辑文史资料，现在仅存两套，需要再版，以便保存；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刚着手出第十三、十四辑……全国便有一万多个单位来订阅。”由于他所在的省印刷困难，好多史料不能及时与研究近代史的同志和有关人员见面。王定南委员说：“中国历史上多少疑难事件，由于没有翔实的资料，致使后来学者绞尽脑汁，翻尽文献，澄清不出一些历史真相。在我们社会主义优越制度下，我们不应给后人留下一些疑难课题。”的确，这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搜集、修改、出版，应有专门的组织专管或兼管，委员们提得很在理。原交通部政治部主任，现担任顾问的梅盛伟委员还有一段话呢：“对有专长的顾问，要结合专业发挥他们的作用，老革命同志也可以参加革命史料搜集工作。”现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下设革命史、政治、军事、工商、经济、文化艺术、科技教育、社会、民族宗教等业务组，这些组多么需要有专长的委员支持啊！梅盛伟委员的话真是一个好建议！当然，过去的一年，已经有不少委员参加了我们的活动，特别是上述各个业务组内的委员，更是费心劳神。军事组组长、解放军

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阎揆要委员、政治组副组长、民革中委焦实斋委员就是以百倍精力工作的。对革命老同志参加革命史料搜集工作，则是五届政协章程新的规定，是我们一项新的任务，它需要革命老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会上，我们就遇到这样一位老同志，他叫周爱民，是江苏省政协常委，早年任过中央苏区兴国县的县委书记。这次我们找他约稿，他很痛快地同意了。是他能写善作吗？要不怎么这么痛快地答应？不然，据他告诉我们，打小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没上过学；那他一定已经有许多资料作参考吧？也没有。据我们了解，他还是“白手起家”。后来，他告诉我们，准备回宁后认真回忆思考一下，想出个要点提纲，然后口述给孩子，让他们帮助写。听到这些话，真叫我们万分感动。

过去，一些委员见了我们，常常询问《文史资料选辑》出版和再版的情况，这次，李子诵、黄祖芬、李侠文三位委员联名向大会写了一个提案，为研究参考需要，建议分发已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和《文史资料专辑》以及重印文革前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如经费有困难，可备价购买。《文史资料选辑》，文化大革命前共出了五十五辑；去年五届一次政协大会以来，又新出了七辑。李子诵等三委员的提案，表达了不少委员的兴趣和心愿，也是对我们做好这项工作的有力鞭策。

五届二次政协大会结束了，它取得了圆满的成果。这是全党工作着重点已经转向四个现代化的喜兆，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下的硕果。我们期待着大会以后的新局面、新任务，也同样期待着文史资料工作能在广大政协委员的共同关心、支持下，取得新的成绩。

（本刊通讯员）

文史资料工作的新课题

史 正

我们的国家，从今年起，进入了以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政协系统的文史资料工作，作为革命史和近代史资料工作的一部分，作为革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分，如何围绕这个新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积极开展起来，是摆在我们文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也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新课题。

自从一九五九年周恩来同志提出搜集、整理、编写文史资料工作以来，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来，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随着文史工作的开展、时间的推移，从征集资料的时间极限和内容上，都需要根据新时期的新任务进一步部署我们的工作。

从时间上来说，二十年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有的已不在人世，在世者也已八十以上的高龄了，亲身经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老人，现在在世界已屈指可数，亲身经历五四运动的老人，也为数甚少了。因此，我们除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抓紧将这些老人所掌握的历史资料“抢救”下来以外，我们的征稿工作的重点也应向以后的历史时期推移，抓紧搜集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史料，否则就会滑过去，因为经历过这些时期的老人，年高者也在七十以上，年龄较轻的也在六十上下了。这四个时期的老人，许多还担负着重要的工作，这就需要我们抓紧时机，把他们所掌握的史料抓到手。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中国成立以来已有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了，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整整是六十年，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年。前三十年的斗争，宣告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后三十年的斗争宣告消灭了剥削阶级。在这两个大的历史时期中，都有着丰富的历史资料。对前三十年我们搜集了一些史料，对后三十年，我们还没有搞，看来，这个任务也同样摆到了文史工作者的面前，否则，时间过得很快，稍一放松，也容易滑过去，这一任务也是很迫切的。

从搜集文史资料的内容来说，文化大革命前，主要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方面的史料，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又偏重于国民党方面的反面资料，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史料，几乎没有搜集，所以要作为一个完整的史料，是很不全面的。五届政协以后，由于许多革命老人参加了政协工作，文史资料工作才增加了革命

史的内容，一年多来，搜集了不少革命史资料，但是由于这项工作抓得较晚，所以还很不够，特别是对我党白区工作的史料更缺乏。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史料，目前除了少数地方政协开始搞外，还只是提出问题。

总之，尽管文史资料的工作本身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有些方面，如革命史资料的搜集还仅仅是开始打开局面。

我们的任务是光荣的，工作也是大有作为的，但是，要完成这个光荣而繁重的任务，除了需要各级领导，特别是做统战工作的领导同志积极支持外，我们搞文史资料工作的同志，还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注意掌握好党的政策，发扬社会主义的学术民主，象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大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一样，把我们的文史资料工作搞上去。

（上接第3页）

又受到压抑的时候，这时提出「兼容并包」，本身就是个进步的口号，它的客观效果是扶植进步力量。蔡先生治学有他独到之处，中国两千年的封建道德规范，没有人搞过伦理学史，蔡先生搞了。学问有短有长，但这种开路精神是可佩服的。蔡先生办学的方针、作风，直到现在，也还有可供参考的地方。

此外，还谈起最近着手收集蔡先生史料的一些发现，主要有：一九一七年五月周总理纪录的《蔡子民先生演说词》和一九二二年蔡先生写的《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对于征集整理蔡先生史料的方法和步骤，大家也提出了一些初步意见，

参加座谈的还有蔡元培先生的长子蔡无忌同志。

（常一）

把“抢救”革命史料放在首要地位

上海市政协文史办公室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于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成立，根据全国政协章程中工作总则第十条第四项规定，结合本市特点，搜集、整理、编写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等方面的有关资料，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服务。

全国政协章程对文史资料工作的规定，为我们指明了工作的新内容，扩展了新领域。由于过去没有着重搜集革命史料，所以这次我们在整理、编写旧存稿件的同时，把及时“抢救”革命史料放在首要地位，先后访问当年在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黄逸峰同志和工人纠察队队员缪龙江、杨福林、任其祥等同志，访问参加“五卅”运动的老工人和上海大学教职员许德良等同志，约请他们回忆亲身经历的革命斗争史实，写成文史资料。上海又是中国工人运动发源地之一。针对这一特点，我们组织了工人运动小组，有计划地搜集一部分厂史和工人运动史料。通过这一年的工作实践，我们深深感到上海的文史资料内容丰富，潜力很大，但许多熟悉史料的同志都已届高龄，及时约请他们撰写或口述史料，确实带有“抢救”性质，这项工作既很重要，又很迫切。

一九七九年，我们又抓住上海解放三十周年，和“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重点，大量搜集资料，集中力量编辑出版《专辑》。我们的初步体会是：

（一）加强党的领导，明确目的和要求。在中共上海市委的关怀和领导下，市委统战部长、市政协副主席张承宗同志对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极为重视，对我们准备出版《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辑》的组稿工作抓得很紧。事先，指示我们编印了《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至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时的国内外大事记》、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祝贺上海解放的贺电和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新华社《祝上海解放》的社论，发给各组召集人和征稿对象，作为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参考。不论大会、小会，他都亲自参加，深入动员，并着重说明这次发动大家写自己亲身经历的革命运动史料，不是写全面的历史，也不是写党史，要求大家解放思想，消除顾虑，本着实事求是和存真的精神，把当年广大党员和革命人民在党组织领导下英勇战斗的事迹如实地反映出来。为了落实稿件，张承宗同志开出近二百人的组稿对象名单和选题范围，并在赴京公干期间，召开座谈会，亲自组稿。他还挤出业余时间，写出《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人民革命运动》

的综合性史料，以身作则，推动组稿工作的开展。这些，都是我们能够顺利进行工作的根本保证。

（二）广泛动员，组织工作及时跟上。为了保证工作的进展，我们建立了十二个小组，包括人民革命运动的各条重要战线，召集人大多是当年领导地下斗争的负责同志。小组建立以后，立即分头抓组织工作，先后召开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共同商定组稿对象和选题，动员面比较广泛，又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大家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据不完全统计，参加这次组稿座谈和写稿的同志共达八百多人次，仅在市政协会议室召开的座谈会即有五十多次，参加人数近六百人。迄至五月底，我们收到的稿件共有一百四十五篇，一百一十多万字。已经收入《专辑》发表的共七十一篇，按篇数计算，采用率约占百分之五十；按字数计算，达二分之一。在组稿、写稿过程中，工人小组几次在本会开会，都从半天延长到一整天，到会的老工人几乎全部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受过冲击，对林彪、“四人帮”颠倒历史、迫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罪行，无不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写出当年地下党领导革命群众进行斗争的史料，用铁的事实来粉碎林彪、“四人帮”的造谣污蔑。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校当年参加青年运动的校友，纷纷返校参加座谈会，许多人奔走相告，组织稿件，搜集有关文物、照片。

（三）措施多样，及时帮助组稿对象解决困难。在这次组稿中，我们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如召开座谈会、个别访问、发征稿信等。还组织写稿的同志参观当年革命斗争的现场，如到上棉二十二厂（原申新九厂）、交通大学等处参观，帮助回忆。在发征稿信时，一般针对组稿对象当时分工负责的工作范围或亲身参加的具体事件，提出选题。不少接信者反映，认为“知己知彼”，针对性很强，写稿易于着手。对年老病休的同志，我们上门访问，将谈话记录整理成文后，再征求本人同意发表。为了采访一九四六年六月“下关事件”的史料，我们访问了年逾九旬的吴耀宗老先生，他特为提供了当时的日记，极为珍贵。对需要查阅报刊资料的同志，由我们介绍或派人陪同往报社、出版社和历史研究所等处查阅有关资料，尽可能及时为组稿对象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完成写稿任务。

（四）通过《专辑》组稿，为今后搜集史料打开门路。在这次组稿过程中，我们和全市各条战线上的老同志广泛接触，进一步了解到他们所掌握的第一手革命史料极其丰富，从抗日战争胜利到上海解放这段斗争经过的回忆和编写仅仅是个开端，许多老同志经历过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八年抗战的峥嵘岁月，还有很多历史资料可写。通过向各地老同志征稿，得到热烈响应，有的寄来稿件和照片，有的提供进一步搜集史料的线索，对我们今后安排选题和组稿对象都有极大帮助。

（五）调动积极因素，活跃政协工作。在这次组稿过程中，不仅广泛动员了



党内同志，而且调动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上的各种积极因素，围绕着“抢救”史料的目标而共同努力。不少退休老工人反映，过去认为退休在家，除了参加街道里弄工作以外，别无他事，现在深感提供革命史料，向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有的社会人士在组稿工作推动下，主动提供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工商界动态和金融界内幕等史料。

我们的工作仅仅是开始，回顾十个月来的工作，也暴露了很多缺点。例如组稿的计划性不强，对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史料虽然提出了护厂、护校斗争的选题，但没有针对某些单位的具体特点，深入发掘生动多样的斗争史料，以致有些来稿的内容流于一般化。同时在组稿、写稿、改稿、定稿中，与作者联系不够紧密，没有抓好共同商讨、交换意见这一环，往往稿子到手，陷于被动。在编辑过程中，由于赶发稿和出版时间，有些工作做得不够细致踏实，往往出现错漏或措词欠妥之处。对于调动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性，做得不够。尤其是对整个文史资料工作还没有通盘的长远规划，因此不能经常做对征稿对象和选题的排队工作，进一步有计划有步骤地发掘各界人士的潜力，及时“抢救”历史资料，这是今后工作中务必全力改进之点。我们深信，在党和市政协领导之下，继续努力学习，勤奋工作，我们的工作任务会完成得更好。

组织力量,突出重点,“抢救”史料

广西政协文史办公室

编者按: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由于区党委的重视,充分认识到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要性,由区政协副主席兼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黄启汉同志带头,跑了许多省市,进行大规模的组稿,搜集到大量的史料。他们的做法,很值得各地参考。

今年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开始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的文史资料研究工作怎么办?如何贯彻落实全国五届政协章程规定的“搜集、整理、编写中国现代史、革命史资料”的工作任务,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任务,是我们应当认真考虑研究的问题。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和全国政协的指导下,充实力量,调配了专职干部,大力开展“抢救”史料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从今年二月中旬开始,我们先后派人员到区内外征集史料。区外,派出十一人组成四个工作组到上海、南京、北京、广州、武汉、长沙、安徽等地组稿;区内,除了去函各地、市、县发动阅历丰富的各界人士和斗争经验丰富的党的老干部撰写稿件外,有重点地到南宁、柳州、桂林、梧州等四个市进行征集工作。由于得到当地党委统战部、政协领导和有关单位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发动有关人士撰写稿件,因而在短短的三、四个月时间内,除预约稿外,已征集到手的稿件共有一百二十四篇,五十二万三千多字。其中区外六十二篇,二十一万三千多字;区内六十二篇,三十一万多字。这些稿件有的价值是高的。如广州林伦彦原是李济深的机要秘书,他写的《关于李济深的若干事》,写了李“闽变前后”思想的转变,抗战之初“倾向民主,反对独裁,广交民主党派,力求进步”。李在重庆期间,“支持中共”,在桂林维护进步文化界人士。“皖南事变,叶挺因伤被俘,李当即电陈诚,请他对叶的安全关注”。“一九四七年春李到香港,提出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的主张,公开反对蒋介石”等等。都很有价值。上海冯英子原是抗战时期桂林《力报》的总编辑。他写的《抗战时期的桂林新闻界》,写了《救亡日报》、《力报》、《广西日报》、《大公报》、《扫荡报》、《中央社桂林分社》、《国际新闻社》、《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等报社及新闻机构的政治态度、内幕;周总理直接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国际新闻社》和《中

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如何贯彻党的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坚持抗战的方针，在文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的情况，史料价值也是很高的。又如柳州韦晓萍原在“C C”要员张道藩手下工作过。他写的《国民党文化运动内幕》，揭露了张道藩控制下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的组织机构、人员、庞大的外围组织圈，“以量胜质”的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文化策略手段，对民主同盟下毒手，组织所谓二、二二运动（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于重庆发生的一次特务捣乱事件）纪念活动，提出“我们需要戡乱文学”的口号等等的内幕情况，也是有价值的史料。

这次我们征集史料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一是得到各方的大力支持。区外的广州、上海、南京、北京、武汉、长沙、安徽和区内南宁、柳州、桂林、梧州等有关省、市党委统战部、政协领导和有关单位都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工作上给予种种方便，帮助提供组稿线索，召开各种座谈会，发动有关人士为我们撰写稿件。如我们原来在家只掌握广州的组稿线索名单三十余人，到广州后经各方介绍，就增加到一百零八人，我们登门拜访七十人，答应撰稿的有三十八人，已交十五篇。二是解除组稿对象思想顾虑。在浙、老桂系资料组稿对象中，许多都年老体弱、多病。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冲击，顾虑多，除了一般的座谈会动员外，还要个别谈心，以消除顾虑。如我们在武汉走访前国民党湖北省主席朱鼎卿时，一进门，他爱人就问：“是来外调的吗？”我们说：“不是搞外调，而是从广西来专门搞文史资料工作的，想请朱老帮忙支持”。这样她才乐意招待和朱接谈。在柳州，有个前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社会科长袁石之。说他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任过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社会科长。那时社会科是专门搞分化、瓦解和镇压共产党工作的。问可不可以写？我们回答说：“可以写，如将当时真实情况写出来，是一篇很好的史料，实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这样他就写了一篇这方面的经历资料。三是对年老体弱的组稿对象要作口述笔录。我们在武汉登门拜访的十八位组稿对象中，有半数以上的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体弱多病，不说执笔撰稿有困难，就是谈话也感到吃力，每次仅能谈个把钟头，我们就采取口述笔录。如朱鼎卿口述的《白崇禧华中崩溃的点滴回忆》，就是经过五、六次口述记录整理成篇的。四是工作组采取新老结合。我们办公室调来专职干部，虽然都是做过二、三十年以上工作的，但对文史资料工作还是个新手。我们采取新老结合的办法，工作组既有专职干部，也有文史资料委员会成员。这样可以生活上互相照顾，工作上互相帮助，特别是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员，由于他们阅历丰富、情况熟悉，不但组稿对象是他们熟悉的老朋友，要求对方写什么，心中有数，可以因题找人，因人出题，还可以现身说法，解除对方思想顾虑。如武汉高鸿彝，因文化大革命挨过整，有顾虑，不愿写。后来刘铁武委员现身说法，说自己也是

参加过国民党督导团的。这样他才消除顾虑，愿意写稿。

从这次外出征集史料工作中，也使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一方面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我们，在广州有个老人余勉群，七十多岁，他懂得很多桂系的史料，我们登门拜访他过后的第三天，就不幸去世了；党的老干部粟稔同志在广州住医院，抱病为我们撰写稿件，真使我们感动。从而更加使我们认识到“抢救”史料是件刻不容缓的事。我们决心把这件工作抓到底。另一方面，我们向全国政协和兄弟省、市政协学习了不少文史资料工作的好经验，对我们今后搞好文史资料工作将有很大的帮助。

总之，我们的工作是有成效的。我们的体会概括地说：党委重视，充实力量。抓紧工作，突出重点。各方支持，“抢救”史料。但由于象这样大规模外出组稿尚属首次，缺乏经验，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我们有的同志对有关方面的人物和历史情况不熟悉，业务水平不高，影响工作进展。同时最近因审阅出版《李宗仁回忆录》，需要集中力量进行核实、注解工作，不能及时评审征来的稿件，发放好稿费，我们决心在工作过程中改正这些缺点。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积极征集地方革命史资料， 为文史资料工作开创新局面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自一九七八年春恢复开展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工作以来，近一年半中，已陆续编辑出版了《浙江文史资料选辑》五辑，共六十余万字。其中第十四辑为浙江革命史料特辑。征集本省革命史料，是解放三十年来第一次盛举，为地方革命史的研究，开创了新局面。

征集地方革命史料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中一项新任务。浙江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就有党的活动，浙江党组织经历了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坚持斗争，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与南下大军会师，迎来了解放，有着大量可歌可泣的革命史料可以搜集，但是过去害怕被扣上宣传地方主义的帽子，一直没有系统地搜集。林彪、“四人帮”更是颠倒黑白，把浙江革命老根据地一笔抹杀。因此，抢救这批革命史料是当务之急。为此，我们首先召开一次老革命同志座谈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征集、编写革命史料工作意见”，并推定老同志为正、副组长，请参加座谈会的革命同志广泛发动，开始有些老同志对于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征集革命史料，感到不好理解，我们就宣传粉碎“四人帮”后，政协恢复活动，增加了一批革命老干部，他们在政协工作中起到骨干作用，把他们掌握的革命史料挖掘出来是完全必要的。

在组织稿件中，也发现有个别老同志认为自己当年不曾担负过重要的职务，一些经历是否值得刊登在革命史料上，我们就用唯物史观的原理来说明，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正是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在党的领导与人民支持下长期英勇奋战的结果，担负过重要职务的领导同志掌握全面，把亲身经历过的事实整理出来，固然是重要史料，但是没有千千万万无名英雄也是构不成历史的，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真理。思想问题解决了，广大革命老同志的撰稿热情有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征集到一本《特辑》的材料。目前还逐步向更多老同志开展征稿。

拨乱反正，抓好文史工作

——广东文史资料工作情况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广东省政协的文史资料研究工作，是在一九五九年冬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立时开始进行的。一九六六年以后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省政协停止活动，文史工作也停顿了。直至一九七七年冬省四届政协会议后，正式恢复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组织，文史资料工作重新开展起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一年多来的工作情况

在四届广东政协文史委员会没有正式恢复以前，一九七三年省政协机关曾暂设一个文史处（后改文史资料办公室），将原政协、省文史馆、及有关单位的一些干部集中起来办公，但还未能从事史料稿件的征集工作，某些负责同志还说文化大革命批判过的东西，不能再拿出来；文革前余存的文史资料选辑不能再发行也不能借阅。显得心有余悸，遗毒未消。工作安排上只是对文革前文史馆遗留下来的部份书刊和稿件，进行整理。这期间，补充修订完成了《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广东自然灾害史料》两书的修订本，（前者已出版发行，后者已交出版社）；编辑了《两广红兵起义史料稿》、《千字文注释》等。在文史资料工作方面仅编印了《广东文史资料分类目录索引》一册，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七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委托，收集整理了一批民国史人物志，和编写了《粤军史实纪要》。工作虽然做了一些，但毕竟还是零敲碎打。比较有计划地把文史资料工作恢复起来，还是在一九七七年底第四届省政协会议召开以后。根据五届全国政协的章程和四届省政协第一次常委会的决定，于一九七八年一月成立了新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有委员三十八人，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三人。委员会设立了办公定，现有兼职主任一人、专职副主任二人、工作人员四人。接着我们又参照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做法，把三十八名委员和其他一些有关人士分成革命史、政治、军事、科技文教、工商华侨、民族宗教等六个业务组，分别联系各方面人士，筹划组稿工作。至此，我们的工作机构算是建立起来了。但是，由于办公室人手少，许多工作一时兼顾不过来，业务组建立以后，许多思想问题和具体事务还来不及解决，所以工作的开展毕竟是很有限的。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重新建立后一年多以来，除了着力于要求党组把人力充